

植根沃土叶常新

——评《中国现代四作家论》

秦新文

《中国现代四作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是陆耀东先生近四年中所出版的第四部学术著作。他的另一部专著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新诗发展史》正在撰写中,他主编的大型工具书《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即将竣稿问世,同时,他又在为全国文科科研重点资助项目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理论》一书作准备工作。近年来,陆先生已步入到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鼎盛期。

《中国现代四作家论》收录了陆先生三十年来潜心研究鲁迅、闻一多、冯至、柳青的论文十三篇。这些论文大都散见于各学术刊物,其中有对历史疑难课题的深入探究,有微观的单篇作品的分析,也有对作家创作道路、生平经历的整体把握,还有史料的搜寻与考证等等,由于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些不同时期的视角各异的论文又具有某些一以贯之的共同特点,使人们能从研究对象中发现研究者本人的身影。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的精神创造活动,那么,文学研究同样需要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陆先生最不满于学术研究上的陈陈相因和无所创见的重复劳动,他长期搏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既不重复自我,更不因袭他人,他对于现代四作家的研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发现、新的突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富于创造性的学术品格。

早在50年代中期,当一些研究者普遍否认鲁迅笔下的狂人所固有的病理特征,以划分阶级成份的方法取消这一形象的复杂性时,陆先生发表了《关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的文章,通过对狂人的言论、行动和心理特征的分析,认定狂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狂人,不是假装的,也不是统治者故意给他戴上狂人的帽子,更不是作者心目中的概念的化身。这种论析冲破了当时批评界庸俗社会学的偏向,使对于《狂人日记》的研究真正回归到审美对象本身,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供继续深入开掘的基础,因此该文发表后常被一些论者提及,被认为是50年代鲁迅研究影响最大的文章之一。新时期思想解放之初,陆耀东先生又涉足于鲁迅与尼采比较论这一禁区,他1978年发表的《试谈鲁迅评尼采》第一次系统归纳了鲁迅在三个不同时期对尼采的不同评价,理清了鲁迅对尼采认识的客观变化过程,同时又特别将鲁迅对尼采的认识过程与鲁迅自身思想发展历程联系起来作动态考察,文章视角新,切入奇特,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刻性和令人信服的真实感,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先后六、七次被一些论著援引其观点或全文转载,赵家璧先生在《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更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试谈鲁迅评尼采》与唐达暉的《鲁迅前期思想和尼采》作为有学术价值的专论文章,是鲁迅与尼采的学术研究的“一大突破”,“一次可喜的大收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从解放后数以万计鲁迅研究论文中选录31篇其中就包括了这篇文章,而陆先生则是该书60岁以下的几位作者之一。1981年鲁迅诞辰百周年,陆先生又与唐达暉先生合写《论鲁迅与尼采》,更为深入透辟地分析了鲁迅接受尼采影响的时代原因、鲁迅与尼采在若干问题上观点的异同、尼采著作对鲁迅著作的影响,并就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文在《鲁迅研究》上发表后,先后五次被转载,在千余篇论文的竞争中入选《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86年又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鲁研室编辑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该书编者在前言中系统介绍了文章基本观点后指出,这篇论文将鲁迅与尼采比较论研究课题推入到了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

苏联“拉普”曾对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产生过很大影响,但中国文学界长期以来并未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

清算,为此1986年陆先生专门撰写、发表了《鲁迅与“拉普”派》的文章,就如何领导文学事业及其工作方式方法问题、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及创作方法等问题,将鲁迅与“拉普”以及受“拉普”影响的太阳社、创造社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较为全面系统地清算了“拉普”左的思潮对革命文学的影响,该文已由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即将由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收录。

《中国现代四作家论》中有关闻一多的《论闻一多爱国诗》,特别是1988年写的《闻一多的新诗与其文化心态》也颇具新意。后者将闻一多的作品与作家的文化心态联系起来分析,既深入探讨了闻一多在政治(爱国)与“纯艺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心态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又从闻一多的新诗去探寻其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此不仅对闻一多的意识而且对闻诗的发掘都有了一种新的进展。而对于另一诗人冯至,因考虑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不深入,更缺少全面整体性把握,于是陆先生撰写了《冯至评传》,有意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总之,陆先生该集的多数论文,给现代文学的研究留下了新的印记,可以说,他的《中国现代四作家论》及其他论著,因其强烈的创新意识,参与推进和深化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一般说来,今天的中老年学者和青年学者之间有一条“代沟”,但陆先生在该书的附录《中国新文学历史比较研究丛书序》中,当他为一批80年代研究生的论文集撰写这篇序言时,他不仅为青年学者群的崛起感觉到一种激励和幸福感,而且认为,这两代人“精神上实无间”,不应夸大“代沟”界限,这刚好说明陆先生有一颗热情、奋进的年轻的心。《中国现代四作家论》所体现的创新精神,我以为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学术上始终保持有这种年轻心态之故,这使他思想敏感、开放,视野开阔。陆先生注重吸纳时代新潮,与时代取同一步伐,不断更新自我,大胆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关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是他运用美学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批评原则的最早尝试,在鲁迅与尼采、鲁迅与“拉普”派等研究课题中,他自觉运用比较论的研究方法,其中《试谈鲁迅评尼采》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运用比较研究解决历史疑难”的最早文章(《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第95页),它为鲁迅与尼采的比较论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张梦阳《鲁迅与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史概述》)。《闻一多的新诗与其文化心态》有意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切入,而《从创作过程看鲁迅杂感的特色》则从创作心理学角度分析作品。正因为陆先生依据不同的研究内容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样就有利于从历史、文化、美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审视作家作品,有利于从中外文化的横向联系中,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把握中,开拓学术思维的立体空间,这就有利于研究的创新和突破。

应该说,对于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学术生涯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来说,能始终保持一种年轻的学术心态和旺盛的创造精神确属难能可贵,然而,陆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又决定他与当代一般青年学者有着某些根本性的区别。他锐意求新、创新,又不偏激、浮泛,我觉得在他的学术品格中似乎注入有武大老一辈学者严谨深沉的传统治学精神。不少评介陆先生论著的文字都有“材料丰富翔实”、“立论严密公允”等类似断语,这些套语用于陆先生却显得格外贴切、准确。陆先生做学问不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就不轻易动笔,不轻下结论。他的《试谈鲁迅评尼采》一文几乎列举、囊括了鲁迅论及尼采的所有作品、文章。《〈为“俄国歌剧团”〉与该团在北京的演出》披露了许多当年俄国歌剧团来北京演出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柳青的创作道路》的长文以及《冯至评传》,更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作家生平所创作的众多作品,展示了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的有机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正因为全面占有资料,才可能有全面的分析,也才能做出稳妥科学的历史评价。陆先生尊重历史,整个身心沉浸于历史之中,这使他的研究不仅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超前意识,而且显示了较强的历史意识和浓厚的历史感;他的论著既有理论的新鲜感,又具备时间的耐朽性。当然,任何人都可能真正超越历史,陆先生该集中某些写于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也不可能不带有当时的历史印痕,即如《柳青的创作道路》所重点论及的《创业史》,到底应当如何评价这部小说中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艺术的影响,应当如何看待柳青反对个别农民首先致富、强调齐步走合作化道路,以及他对中农所持的批判倾向等等,作者自己似也认为有继续探讨分析的必要。